

法捷耶夫与文艺批评

赵德泉 夏忠宪 陈明至

苏联杰出的作家亚·法捷耶夫(1901—1956),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至1956年5月13日逝世,从事文学活动三十余年。法捷耶夫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几部堪称苏联革命文学不朽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批评著作,其中包括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法捷耶夫一生都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探索充满了勇敢的进取精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法捷耶夫非常要视文学批评,他对文学批评的目的、方法、作用、原则等都发表过大量的、绝非浮浅或仅仅是打打官腔的论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毫不敷衍地身体力行,亲自提出了正确的批评的理论和原则。批评别人,他是严格的,有什么讲什么;同样,他批评自己也毫不留情。他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讲真话,这样的批评才是科学的、革命的批评。1951年,法捷耶夫在一次晚会上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批评界和文艺理论界有一批新的干部在科学院讲课,他们在谈到苏联文学的发展时,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发展,也指出了我的和其他作家们的错误。然而这种批评并没有使我们生气;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这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已经前进了。但是,对这些错误不能置若罔闻;我们的经验在许多方面对其他人可能有好处。”^①

法捷耶夫晚年在编写《三十年间》这部文集时期,系统地清理了自己早期的文艺观点。他认为公开发表自己早年的文章是有益的,尽管不少问题是有争议的。他不希望“美化”自己活动中的任何一处。他指出:“分析作家以前的作品时,需要事先声明,需要讲清楚,不能一笔勾销这一切,因为当时就是这样理解事物的,而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②法捷耶夫发表“拉普”时期的文章旨在通过总结自己走过的艺术探索的道路,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1947年法捷耶夫在总结其文学道路时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过去岁月中的全部思考和探索的话,那么,简言之,这就是试图确定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在自身创作中的作用、意义和地位。”^③“拉普”时期年轻的法捷耶夫对“拉普”的许多极“左”的观点都是赞同并积极执行和维护的。他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批评著作有着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毛病,如他错误地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艺术创作方法混为一谈,把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混同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并把浪漫主义曲解为似乎只是“使现实神秘化”或“虚构英雄个性”的一种有害无益的创作方法。因此,1929年9月他在“拉普”第二次全会上做了题为《打倒席勒!》的错误报告。在此以后的年代里,经过不倦的学习、探索和实践,法捷耶夫逐步认识和修正了早年的错误观点。尤其是1932年联共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家组织的决定之后,他认

真地重新考虑了对浪漫主义的看法，进一步探讨了浪漫主义做为一种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作用、意义和地位。到了1954年召开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时，法捷耶夫又一次公开承认早年的错误观点。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拥护过这样的观点，当时甚至还写过《打倒席勒！》的论文。过了一些时候，我才了解，苏联文学是要把人类在它过去发展中所创造的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完全继承下来的。当然，这种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的确常常正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当中。但是从我们的古典文学遗产中抛弃掉席勒，那是愚蠢的。”④他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了所有能够正确描写处于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创作方法，因此它必然要包括革命的浪漫主义，“没有这种浪漫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恰如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对于一切落后、保守的事物的批判态度”⑤一样。法捷耶夫在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生活，提出“走向生活，热爱生活”的同时，他反对那种“不能展翅飞翔的”、不能从现实中看到未来的文学，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应该，也有责任看到明天”，它应该“在今天看到明天的轮廓。”从排斥浪漫主义到承认浪漫主义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法捷耶夫经历了二十年之久辛勤的探索。当然，法捷耶夫也并未由于批判“拉普”的某些错误口号，对自己早期的理论观点良莠不分，一概加以否定。他作为一位党员作家，对党中央决议和文艺政策是热情宣传和积极支持的。1932年联共中央作出改组文艺团体，取缔“拉普”等组织的决议，法捷耶夫毅然纠正自己思想上的“偏颇”，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讽刺和挖苦，最先退出派别组织，并在《文学报》上发表了《新与旧》这篇“退派”的宣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协助高尔基筹建苏联作家的统一组织——苏联作家协会。

初步文坛的法捷耶夫血气方刚，锐气正盛，他热爱党的文艺事业，他总觉得自己年

富力强，应该多分担些事务性的工作。这对于他从事专业创作，当然会有影响，但这是为了党的文学事业，所以，他干得很欢，而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任劳任怨。有时他也感到矛盾。看到文学界的派别斗争激烈，他心急如焚，焦虑不安，甚至搁下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写作，“投入战斗”，并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高尔基，向他求教。苏联青年作家的良师高尔基一向把派别斗争视为可悲的“幼稚病”。他对作家属于哪个派别从不感兴趣，他知人论世，评价一个作家，首先看他的作品。高尔基作为长辈在给法捷耶夫的回信中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如果您丢下长篇小说的写作，搅到纷争中去——这将是愚蠢和不可饶恕的。……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长篇小说的写作，暂时忘掉其他的一切，干好这件工作吧……。”⑥到了晚年，法捷耶夫更加体会到高尔基这番教诲的真正含义。他十分懊恼自己写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法捷耶夫后悔不该为党的文学事业做了大量的团结作家的组织工作。法捷耶夫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建造者。我们想掌权只有一个目的——实现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⑦回顾法捷耶夫多年领导苏联作协的工作，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作家正是抱着为“实现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光明磊落，秉公执言，不徇私情，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案，不少正直的党员作家被开除党籍。著名作家李别进斯基就是受害者之一。法捷耶夫同他在二十年代初认识以后，就成了莫逆之交。法捷耶夫相信李别进斯基是个好同志，他在党的会议上挺身而出，公开为自己的同志辩护。他说：“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候，就是他的党内的同志的话比

一切材料都更具有说服力。多年来我了解尤里·李别进斯基，我愿以自己的党证和自己的头颅保证他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⑧ 尽管如此，李别进斯基还是被开除了党籍。但法捷耶夫一直同他保持昔日的友情并深信总有一天李别进斯基的党籍会得到恢复。这件事说明法捷耶夫的为人是令人钦佩的，这种相信同志，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

字斟句酌 精益求精

法捷耶夫从初学写作开始就孜孜不倦地“探索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艺术上的成功都要作家付出艰辛的劳动和认真的探索，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何况，当社会主义文艺处于初创阶段时，诸如如何表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都是尚待实践的新课题。当时，有不少作家不去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的自觉的革命斗争，却去美化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去描写现实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新的主人公，而是一味追求“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粗鲁的自然主义”，不是学习运用劳动人民丰富多采的语言，而是玩弄华丽的辞藻和矫饰的文体。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法捷耶夫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泛滥》（1923年），在创作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部处女作既有着与上述倾向完全不同的新内容、新主题、新主人公，又在艺术形式上受到了某些不良的影响。这时的法捷耶夫还没有找到表达新内容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泛滥》一发表，评论界有褒有贬，但总的说来是受到欢迎的。法捷耶夫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对自己的习作越来越不满意。到了1932年他公开承认《泛滥》是一部“很不完善的”，“不认真的，草率的作品”，这主要反映在“结构松懈”，“意思模糊”和“语言恶劣”^⑨等方面。

短篇小说《逆流》是法捷耶夫的第二篇作品，它比《泛滥》写得好，这是人们公认的。作家本人也觉得“这部作品虽然情节并不完

善，语言有严重的缺点，但是主要的思想是清楚的，故事的艺术说服力也比较强”。但是不久之后，法捷耶夫又觉得“这部小说的缺点比它的优点更显著了”。^⑩ 发表了两篇小说之后，法捷耶夫对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思索，他的创作道路上出现了将近两年的所谓“停滞时期”。通过创作实践他开始意识到，即使手中掌握具有了一定社会意义的题材，而没有丰富的文学语言和掌握语言的娴熟的技巧，还是不能对形象作历历如绘，奕奕传神的描写的。这样就难以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深化和提高。因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在语言上下功夫，才能使读者对于作家所创造的东西引起完整的诗的印象。”法捷耶夫早期就十分注意锻字炼句，注重“培养自己善于寻找能够引起读者必要的情绪、必要的心境的节奏、词汇、语句”。^⑪ 就这样，他严格地剖析了自己的两篇习作，他开始在语言的探讨上下功夫，精心选择和组织，反复推敲斟酌，不厌其烦，一改再改。

《毁灭》（1927年）不仅在法捷耶夫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是苏联文学史上代表一个阶段的优秀作品。它以惊人完美的简洁，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思想，它以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丰富了年轻的苏联文学，那么，《毁灭》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作家本人曾经说过：“……批评家们说小说写得很有才华……我不只一次地想了想自己——我究竟有没有才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是靠才华，而是靠埋头苦干……我一连数小时地就象钉在凳子上一样，绞尽脑汁，几十次地翻来复去斟酌同一个句子……最终找到一个最好的句子。”^⑫ “我在这个长篇上花了很多功夫，个别的几章改写了无数次。有几章我改写了二十次以上……没有一章改写的次数是少于四、五次。”^⑬

《毁灭》给作者带来了声誉，但他并没有因此就飘飘然，沾沾自喜。1948年法捷耶夫在给评论家普什明的一封信中诚恳地指出这

位评论家在其著作中过份夸奖《毁灭》作者的地方。例如，法捷耶夫极力反对普什明在大自然的描绘方面把自己“同经典作家加以对比”，并说自己比他们“高明”。他对普什明这种“按着拉普派那一套”“简单粗暴”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在风景描写方面我在经典作家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因为“大自然、风景——这是如此细腻的活儿，需要动用的是外科手术刀，还要格外精心”^④。又比如，法捷耶夫凭着一颗纯洁的艺术良心，婉言谢绝某些编剧打算把《毁灭》搬上舞台的建议，他谦虚地认为《毁灭》的局限性很大，并推荐《苦难的历程》和《静静的顿河》等作品。

比起《毁灭》，法捷耶夫另一篇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克格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从三十年代到现在，苏联评论界对于这部作品毁誉不一，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这其中有的是正确的，也有的是不公平的。评论界（包括高尔基在内）对小说的前两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过，随着小说第三部的问世，评论界和读者的看法与前大不相同，以至《文学报》于1936年初把这部小说的第三部作为“过去一年里的重要文学事件”^⑤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可贵的是法捷耶夫善于听取有益的批评，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一部比一部更完美，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最后一个乌克格人》的写作占了法捷耶夫创作生活二、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部新型的革命史诗，它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哲理性强，就其反映历史事件的广度和深度说，可以把法捷耶夫这部线索复杂的多声部的作品看作是丰富的革命现实的“全景文学”。法捷耶夫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种新型的史诗的艺术形式，并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他联系《最后一个乌克格人》的得失，深有感触地说，要写这样一部作品，他本人的艺术素养还嫌不足，他动笔了好几十次，可是每次都没有成功，不是形象的轮廓模糊不清，就是素材提炼不精。

因此在他五十岁时，还打算把这部小说写上二十年，可惜作家过早逝世，未能实现自己的宿愿。然而，研究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对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探索的经验，颇有价值。

我们不妨再看法捷耶夫怎样对待自己另一部成功之作《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1945年初版问世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肯定，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作者收到了一万八千封读者来信，而1951年修改本发表以后，至今已经发行一百五十版之多。

在一片赞扬声中，法捷耶夫的头脑是清醒的。还在《真理报》1947年12月3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批评小说《青年近卫军》忽略了对“党、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教育作用”的描写之前，也就是同年的1月10日，他在一次读者讨论会上说：“……我还得不断地回到《青年近卫军》上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要稍加修改。这是因为，对于你们来说作品已经问世，可以讨论了。而对于我来说，这还是一块尚未完全冷却的金属，还不能用手去触摸，许多东西我还没有发现。我需要一段时间，好让我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一切，到那时随着年岁的增长使某些东西逐渐地得到修改、补充或删减。”法捷耶夫懂得，一旦作家从自己心爱的、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作品（如《青年近卫军》）写作的激情中摆脱出来之后，他才有可能“客观地看待一切。”因此，法捷耶夫没有因为小说获得极高的声誉而盲目地自满。

法捷耶夫对待党报批评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刚刚受到《真理报》批评之后，他在一次与选民会见时表示：“只有那些不爱工作、或者不想工作的人，才害怕批评。我完全有可能改正已经正确地给我指出的那些错误，——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做到这一点。”三年后，1951年12月法捷耶夫在同捷克作家的谈话中透露说：“你们以为当我听到说我在《青年近卫军》中不正确地描写了老一辈时，我感到舒服吗？当然，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不

能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客观的，他们不是以这种批评让我威信扫地，也不是要毁我的书。批评只是指出，如果在这本书里把老一辈描写得更正确些，那就会更好了。经过三个不眠之夜，……我决定改写我的书。尽管时间不多，我并不着急，我改写了三年，现在已经有《青年近卫军》的新版本。……我增写了十个印张的正文。我很高兴地利用了新的资料，用尽了心血，我想新的章节不会毁坏作品的。”^{①7}小说前前后后做了近三百处的修改，这是作家高度严格对待自己创作的实例。

《真理报》的批评正值苏联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鼎盛时期，对作品的批评难免有不公道的地方，“并不是全部都令人信服的”，这不仅是对《青年近卫军》一部作品而言的，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对整个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苏联评论家节林斯基指出，尽管如此，“法捷耶夫仍然极为认真地对待这项改写工作。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法捷耶夫，就这样以自己的行为在艺术领域内作出了榜样，表明了个人的内心信念应该怎样跟社会要求结合起来和作家应该怎样对待批评。”^{①8}

总的说来，新版本使一本“好书变得更好了”（《真理报》语），加强了小说的教育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贴切，刘季柯夫、普罗庆柯等布尔什维克的形象更加动人、更为崇高；奥列格等青年近卫军队员形象更具有特色；新增写的几章使作品内容更为充实，生辉不少。总之，新版本得到了党报和社会与论的肯定，作家本人也比较满意。

然而，斯大林逝世之后，围绕《青年近卫军》又掀起了一场风波。西蒙诺夫等人否定当年《真理报》对这部小说的批评，认为这是斯大林对文艺的粗暴干涉。突变的风云把《青年近卫军》连同作者卷到政治漩涡中去了，他不得不重新修改自己的作品。这一次修改主要是删去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描写，消除所谓“个人迷信”的影响，凡是提到斯大林名字的

文字几乎全部被砍掉，如第五十三章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抒情描写的最后一段文字——“斯大林格勒——这是一位天才的伟大的成果，这个水垂青史的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①9}——在五十年代末出版的法捷耶夫五卷集中已被删掉。法捷耶夫在逝世前半个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示：“这段时间生活中发生了这么多新的原则的东西，使得我的长篇小说又得重新大改了。”^{②0}

法捷耶夫晚年的经历是艰辛的，其命运又是悲惨的。但是综观其全部创作过程，他这种虚心接受批评，严格解剖自己，努力改正错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热爱生活 自强不息

法捷耶夫在逝世前两个月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的性格仍然很是好动，热爱生活，习惯于看到自己身体强壮，有工作能力，而不是弱不禁风和消沉。”接着他又说：“现在谈谈‘情绪’，‘感受’，‘困难’。亲爱的朋友，在这方面我同一般人差不多，特别是那些年龄已经不轻的人！但是我的性格没有改变，生活我仍然是热爱的，而且善于为生活而欢乐。不愉快的事情和甚至是复杂的事情也常常发生，不过中间总是渗杂着好事情……而且我们都不是当年高尔基写到过和至今还是很多的‘机械的公民’：在人民和国家的生活中以及我们的活动圈子里一切都是在战斗中、在新的冲突中进行的，同这里的困难和缺点有关的一切，我们都是有所感受的，而且感受得很深，有时甚至很难过。但是我的一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我对此已经习惯，没有它，生活在我看来似乎就贫乏了。”^{②1}

法捷耶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战斗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领域，为捍卫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原则，不仅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最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上也是严肃的，认真的。为了党的事业，他严于律己，对于同志们的

缺点和错误，他总是出于公心，提出批评，尽管有时难免主观片面但却总是与人为善的。他把批评看得同空气一样重要。他主张批评应以教育为目的，批评应该给人指出前途，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因此，“只有那些真正热爱文学又爱护和关心作家、为作家前途着想、具有相当的知识、能够指出发展的正确道路的人，才能够开展这样的批评。”他告诫作家们不要害怕批评，虽然听到批评是不舒服，不好受的，但是“一个人为了明白事理，应当受点苦，受点折磨”。^②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更不要拒绝批评——这是法捷耶夫始终遵循的原则。

法捷耶夫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深深地体会到作家要相互学习，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同志都有益处。他说：“我对几位作家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感谢，因为他们的创作和就我们全部文学工作所提出的直率的批评意见，对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我的发展，曾经起过最大的影响——那就是李别进斯基、谢芙琳娜、伊凡诺夫、列昂诺夫、费定、肖洛霍夫、卡达耶夫……我从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里和他们的批评意

见里得到了很多教益……”^②

法捷耶夫的为人，有口皆碑，深受国内外作家的尊敬。正如他的老朋友，我国著名诗人肖三同志所说“他待人诚恳热情、自处谦虚朴素。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称他是一个好同志、好朋友、真正的人、大写的人。”^④

法捷耶夫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毁灭》、《青年近卫军》等名篇巨作，而且他那高贵的品质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范例。

注释

①④⑤⑪⑫⑭⑮⑯ 《三十年间》，第563、597、402、942—943、931、560、619—620页。

②③ 《法捷耶夫文集》第4卷，第711页。

⑥⑭ 《法捷耶夫文集》第5卷，第599、564页。

⑦ 见《同时代人回忆法捷耶夫》。

⑧⑫ 同⑦，第208、153页。

⑨ 《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一书，第46页、52页。

⑩ 同⑨第52、56页。

⑬ 见《俄苏文学》1981年第6期第86—87页。

⑰ 《星》1936年第10期。

⑱ 同②，第563—564页。

⑲ 见《法捷耶夫评传》一书，第152页。

⑳ 见水夫译本《青年近卫军》第688页。

㉑㉒ 见《世界文学》1960年第2期。